

序

毛昭晰

在去年纪念金海观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我曾建议为金先生出一本纪念文集。经过萧山市政协以及金海观先生的许多学生的努力，这本集子将在湘湖师范七十周年校庆的时候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应囑写了这篇序。

我没有见过金先生，没有机缘聆听他的教诲，但是我很早就知道金先生的大名。在我的熟人中有许多人和金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把金海观先生推荐到湘湖师范去当校长的郑晓沧先生。郑先生是我的父执，我考入浙大后，郑先生又成了我的老师，后来在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我们又成了同事。所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有许多机会听郑先生和其他一些同志谈起金海观先生。我对金先生所知越多，对他的敬钦之情也就越深。

金先生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靠着自己的艰苦奋斗，读完了高等教育的课程。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之后，他曾先后在南高师附小、河南第一师范、江苏第七师范、浙江第四中学、中华书局、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成都大学等单位任职，但时间都很短。1932年他到湘湖师范任校长，直到1956年底，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他的一生和湘湖师范是不可分的。金海观先生之于湘湖师范，犹如蔡元培先生之于北京大学，竺可桢先生之于浙江大学，其功绩永远不可磨灭。湘湖师范因为有金先生及其同事们的苦心经营，才成为一所名闻遐迩的师范学校。

湘湖师范是1928年在陶行知先生的协助下创办起来的。但是一开头工作并不顺利，从1928年到1932年四年的时间，校长换了

五个,金海观先生是第六任校长。

金先生到湘师任职的时候正逢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十九路军奋勇抗击日寇,全国各地民众纷纷慰劳捐款、支持十九路军。金先生到校之后向全校师生发表讲演,号召师生们捐钱捐物,慰问抗日将士,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这是金先生爱国思想的体现。金先生办教育,自始至终贯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他要使每一个学生都能以天下为己任。

在办学方面,金先生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注重生活教育、生产教育、劳动教育、科学教育、社会化教育、工学合一教育等六个目标。这六个目标都环绕着振兴农村教育这个核心,其目的在于挽救农村凋敝,重视乡村建设。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金先生请他的老师陶行知先生来校讲学、建立湘湖初等教育实验区、创办学制试验班、建立石岩村生活改进区。为方便与石岩村的联系,金先生带领湘师的学生和教师兴建了东湘堤,这条堤现在经过拓宽改造,成了萧山县城到闻家堰的主要通道。

按照当时湘湖师范的制度,学生学完各种课程后,要到教学岗位上服务一段时间,经考查合格后才能发给毕业证书。这种服务,有点像现在的毕业实习。但又不完全是,因为金先生不仅仅重视学校教育的成绩,他更重视的是社会实践,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为了了解服务生和毕业生能否适应社会,他成立了校外学生视导部。他亲自到各地去进行视导,把视导中了解到的许多实际问题进行总结,用来改进学校的教学工作,使湘师的教学质量大大的得到提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先生一面组织全校师生宣传抗日,一面努力维持教学秩序。11月5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金先生不得不作迁校的准备。当年11月下旬,学校迁到义乌江湾,翌年1月迁到松阳古市。1942年日寇进犯金华、丽水等地,金先生又带领师生们转移到庆元的竹口、黄坛、新

各地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学生运动。一向有民主堡垒之誉的浙江大学学生走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列。湘师与杭州仅一江之隔，学生们也走上了街头，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金海观先生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施加的种种压力，和进步的师生站在一起。金先生不但支持湘师学生的革命行动，而且千方百计保护和营救进步的学生和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湘湖师范在解放前民主空气很浓，有人统计解放前夕，湘湖师范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加了浙东游击队，解放初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和湘师有金海观这么一位好校长是分不开的。

由于金海观先生在教育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后不久，他当选为萧山县第一届政协副主席及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第一届政协常委，第二、三届委员，同时他还担任了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52年他参加了马叙伦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曾经担任民进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1月，金先生被调到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担任秘书长的的工作。虽然丢开教育业务来做党派工作，有违金先生的心愿。但金先生仍是怀着对党的一片赤忱，服从组织的调动，来到杭州。在新的岗位上，金先生仍和在湘师一样的认真负责，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不辞辛劳，进行调查研究，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

1957年反右时，金先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令他痛苦的是，他始终不明白自己错在何处。据熟悉金先生的同志告诉我，就是在那样的逆境里，金先生仍然对工作非常认真。他每天在民进机关里做着打扫卫生，分发报纸，布置会场等等杂务而毫无怨言，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宽阔的胸襟啊！

之后，金先生被调到了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文革”期间，他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终于积忧成疾，于1971年6月与世长辞了。

金海观先生一向淡泊名利，廉洁奉公，国民党几次以高官厚禄相邀，都被他严词拒绝。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给了自己的学生。在纪念金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大会上，有那么多的人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纪念他，说明金先生人格之力量。金先生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和继承。

愿我们大家都向金海观先生学习，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我们的力量。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浙江省老教授协会会长）

怀念父亲

金 陵

父亲任湘湖师范校长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人们对他的怀念却不因岁月流逝而稍减。这些年来，我捧读了几百篇回忆、纪念和研究文章，还有一本传记。人们称述他毕生兴办教育的业绩，评说他进步的教育思想。一位爱国的民主的乡村教育家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更加清晰而丰满。然而最难抹去的仍是童年的记忆。他总是那样从容不迫，有时与友朋相聚还会谈笑风生，颇有古时隐居山林的名士神韵。其实学校里里外外的事情一件接一件，他的忙碌是没有尽头的。在平实的外表下蕴藏着无穷的精力，似乎工作之繁杂、环境之艰难甚至险恶，都压不倒他那并不壮实的个子。半旧的中山装或学生装（三只口袋不带翻领的那种），圆口布鞋（永远是布鞋），同当年的普通教书先生没有任何两样。

父亲的朴素衣着，其实正是体现他的追求。他生长在农村，从21岁考入南京高等师范起在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生活了十四个春秋。到了35岁那年，却辞去大学教席，重返农村，接办湘湖师范。不是因为城市谋生无门，而是因为无法割舍同农村的血缘般的感情联系。即使以我幼时稚童的眼睛，也能从他从事农事劳作的习惯，从他与乡间来人谈话的亲密神情，窥得这种农民情结。这种情结此时升华为理性的思考，结晶于坚定的人生道路选择：投身乡村教育事业。“中国大多数人为农民，所以吾辈服务农村，不但为学乡村教育者应尽之责任，实亦今日吾国教育界中人应走的路线。”他作了这番宣言，也就义无反顾，沿着这条路线脚踏实地走了二十五年，从35岁走到60岁，直到1957年奉调离开湘师出任民进浙江

省筹委秘书长时,还觉得“殊非心愿”。二十五年中,他多半时间生活在农村。湘师设在萧山乡间的湘湖,借用压湖山麓的湘云寺为校舍,湖上的小舟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父亲把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我7岁,弟弟尚在襁褓中)从南京接来,在压湖山半山腰自己出资盖了两间茅屋(雅号“东山草舍”),开始了“自视为一个农民”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期在古市,我家的住处由广因寺的牛栏改造而成(也是自己出资)。谈不上任何现代生活设施,出门只能靠双腿。父亲外出办事,在崇山峻岭中一日步行百十里是常事。抗战胜利以后,因为湘湖原址毁于战火,湘师才在萧山城里借用祇园寺上课。我家就住在偏殿的一角,与校医室以木板相隔。高大的泥菩萨依然矗立着,甚至没有略事遮拦。

父亲有意选择在农村办学,为的是使学生熟悉农民和农村环境,以适应毕业后的农村教育工作,也为的是能够直接为驻地附近的农民办民校、医院等教育事业和社会事业。湘湖医院从1933年9月21日开诊到1936年12月底的三年多时间内,为附近农民诊治27897人次。湘湖周围办了14所小学,以及一批农民教育馆、问字处、代笔处、成人夜校、妇女夜校等。在古市四年,办民校97所,共156个班级,4480名学生。在新窑因鼠疫流行只停留半年,也办了8所民校,14个班级,收了430名学生。湘师学生夜间分头去附近村庄教课,我当时是附小学生,也曾打着灯笼到农民家充当“小先生”。那时“为人民服务”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口号,但是父亲有自己的说法:“为老百姓做事”。在艰苦和简陋的条件下,湘湖师范的师生为老百姓做了不少事,也赢得了老百姓珍贵的友情。

父亲一心在农村办学,不屑谋仕宦。国民党教育部曾邀他任中等教育司司长,为他坚拒。青年党提名他任省府委员,他退还原信,并去信严斥。他极其鄙视官场钻营之道,耻与钻营者为伍。作为省立学校的校长,他难免要同教育厅长打交道,然而孤高依旧。他曾向友人剖白心迹:“前数年主管长官对我不满意,……我也有些疑

惑,但后来决计不管。我照我自己的判断去做,不迎合(如出刊物或起房子的时候请一二等要人写字和做序文等),不献媚(如候起居,我除开会时因发表意见与厅长有谈话外,从不作私人访候,历陈、叶、许三厅长皆然;或因毕业式及其他集会请训话等),本着朴素的态度来办我的学校。……迄今思之,一切事只得如此做法,方为操之在我。唯亦有讥其不识时务者,则受之而已。”每当重读这段文字,总不免被深深触动。但愿我们的社会里多一些这样的精神境界,少一些走门子、拉关系,汲汲乎于仕途者!

顺便提一句,为湘师校刊《锄声》题写刊名的,确非要人名流,而是驻地附近石岩、定山、徐家坞、塘下施等村的农民。每期还为题签者立传,称“农友小传”。

湘师学生多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这也是父亲招生方针的体现。父亲体恤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来之不易,又希望他们学业有成能返回农村教书育人,总是以长者的胸怀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完成学业。湘师校友们所写的回忆文章中,有多少这方面的动人事例!穿不上冬衣者忽然有学校找来的裁缝缝制棉袍,缺少菜金的学生分班级轮流领取我母亲自制的豆腐,买不起也买不到药品的夜盲症患者得到了托人购自集镇的猪肝,家遭火灾的学生得到了救急的大米,无力继续上学的学生被安排在校内干些可以略有收入的杂活,就业无门的毕业同学持父亲的介绍信和路线图走向工作岗位。这些点点滴滴的细小事情,在那个物资匮乏,条件艰难的年代里,曾经解救了多少学子的急难!它们出自本身经济拮据的父亲之手,又曾温暖了多少年轻的心!

父亲对学生要求严格,尤其在做人方面。连被一些人看作小事的日常公共生活道德,他也从不含糊。学生因此多少有些怕他。其实他并不训斥人,甚至很少疾言厉色。他同学生一起出晨操,一起做公益劳动,经常到班上听课或代课,经常出席学生的比赛、演出等社团活动。在这些教室内外的学校生活中,他处处以自己毋需勉

怀念爸爸

金 湘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1971年6月的一天下午,当我从新疆日夜兼程匆匆赶回杭州,刚一迈进家门,映入眼帘的是:全身瘦得皮包骨头的爸爸半昏迷地斜躺在床上,白发苍苍。神态疲惫的妈妈跪在床边为爸爸去翻身……妈妈看见我们(还有去车站接我的哥哥)一进门,急促而低声地呼唤着爸爸:“阿湘回来了……”我冲上去,紧握着爸爸那双肿得几乎要爆裂的手,轻轻地喊着:“爸爸、爸爸,我是阿湘……”。爸爸已经无力睁开眼睛,我只感到他双手微微一颤,轻喊了一声:“难得……!”又讲了几句话,两行泪水从他紧闭的眼眶流向双颊……就再也没有声音了!我这个去新疆这么多年,生活再苦,人格再受歧视也从未掉过一滴泪的男子汉,此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为了不让妈妈悲痛,我紧咬住了嘴唇,然而泪水却再也无法抑止地默默流了下来,滴在爸爸的手上……我那几乎早已麻木的情感被震颤了!好苦啊,命运难道就是这样安排我们父子阔别十几年之后的重逢吗?!

当夜,爸爸就含冤去世了。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还能说什么呢?!)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是当第二天一早,殡仪工入来拖走爸爸的尸体之后,妈妈——我那多年来一直承担着一切精神上的痛苦与肉体上的劳累的妈妈,才失声痛哭起来。我和哥哥忙着处理各种杂事,脑中是一片空白……只是在到了殡仪馆爸爸遗体火化之前最后向他告别时,我们五个人(妈妈、哥哥、姑母、我和我的女儿)才得以静静地站一会、站一会……

向着爸爸的遗体,我在心里凄然地喊了一声:爸爸,不是我不

愿赶回来照顾你，而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无辜的失去自由的人啊……这难道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吗？这难道就是你这样一位耿直、清白、勤勤恳恳忧国忧民的人应有的遭遇吗？！……我悲愤到了极点，双脚犹如被钉住了，一动也不动地站着，而思想（那无法禁锢的思想）却在激烈地翻腾……

我离家那年（1949年）才十四岁，还不能完全懂事，但爸爸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极深的：

他那一身布衣两袖清风的俭朴生活；

他那出门全靠“十一号汽车”（我们对双脚走路的戏称），日行百里的艰苦奋斗精神；

他那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廉洁作风；（我还记得爸爸为我用了一张公用信笺写字而严厉地训斥我……）；

他那科学安排日程，抓紧每分钟全神贯注地工作的治学态度（记得妈妈常怪爸爸把时间排得太满，以致每次去杭州，刚跨上火车，车子就开动了……，而爸爸却以此为乐。）

他那烟酒不沾，早就是“清茶一杯”的待人接物；

他那渊博的知识，动听的谈吐、爽朗的笑声；

他对我既严厉（有几次还拍桌子训斥我），又慈爱（我还记得在古市时，他常用胡子扎得我嗷嗷叫的那幸福的童年……）；

……

这一切，无不一一印在我脑海中，汇集成我记忆中的可敬可亲的爸爸。

50年代初，我也像中国大地上的一切知识分子一样，投身到思想改造的热潮中，如痴如狂地否定着自己——当然，也包括对自己的爸爸。

以后，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经历了1957年和1966年两次风浪之后，我开始懂得更多了，也就逐渐更真正地理解爸爸了。

我想到，当 20 年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纷纷去英、美留学，爸爸当时也具备这个条件的，但他毫不追逐个人名利，毅然投身乡村教育，而且身体力行，一干就是一辈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动？！

我想到，抗战时期，在国家民族危急的关头，爸爸没有豪言壮语，而是用行动来说话；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担负起湘师内迁的重担，付出了全部心血，他克服了一切困难，与全校师生共存亡，终于历尽千辛万苦把湘师在抗战胜利之后完好无缺地带回到了萧山。这又是什么行动？

我想到，在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镇压进步学生之时，爸爸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又一次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保护了青年学生，这又是什么行动？

我想到，解放初期，也像一切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投身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他对自己那本已十分廉洁，清苦的生活，一再检查，交代……这又是什么行动？

想一下，当大家正热诚地帮助党整风，爸爸是浙江省人大代表，真心诚意地把下去视察时看到的一些问题向党提出时，却被当成“别有用心”，……爸爸没有气馁、灰心，他虽有痛苦，但还是坚定地相信党，他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当时他已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而且还患有肝病），努力改造自己，这又是什么行动？

再想一下，当“横扫一切”之声震耳欲聋这几年，爸爸受尽了人格的侮辱，最后又身罹绝症，但他一面仍积极工作（每天到政协文史室去上班），一而又总为自己对人民贡献太少而感到痛苦……这又是什么情操！！（后来我从妈妈处得知，爸爸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那最后的几天，曾而对自己的老师郑晓沧先生呜咽失声。他谈到自己贡献太少，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国家……这可能是爸爸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哭泣！这哭声发自一颗多么高尚、善良的心！这又是一颗被多么不公正地对待，长期不被人理解，自尊心遭到凌辱，

中真是一瞬又一瞬，一眨眼，一生就过去了，但，既然把我生到了这个世界上来，这一生还得要好好过，好好奋斗，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点有用的事，就像爸爸一生一样！——这就是我想向已经离开我十五周年的爸爸和离开我一周年的妈妈讲的一句心里话！

怀念我的爸爸！

怀念我的妈妈！

一九八六年七月

挥泪急就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音乐学院作曲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

纪念老校长金海观先生

阙沛霖

我是1988年10月从严州师范调任湘湖师范校长的。到湘师前,在参加省陶行知研究会的活动中对湘师已有一定的了解,知道湘师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1928年亲自筹划和参与创办的一所乡村师范。建校后,陶行知先生又多次亲临指导,是生活教育理论的策源地之一。特别是陶行知的学生金海观先生自1932年起接任湘师校长,精诚办学,以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带领广大师生实践和发展陶行知教育思想,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使湘师盛开生活教育之花,被誉为“浙江的晓庄”,成为浙江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所名校。到湘师后,我经常强烈地感受到老校友们对湘师母校、对老校长金海观先生,以及校友之间那种特殊的深情,几乎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一些在三十年代就读于湘师的老校友,如今已是白发苍苍,有的定居在西北边疆,有的安家在白山黑水间,甚至远在海外,只要有机会来浙江,总要赶到萧山来看看母校,甚至要去湘湖寻访老校址作旧地重游,说是“回娘家”。北京、上海、东阳、松阳等地的老校友自发成立了校友会,定期活动;相互关心,编印通讯,联络感情。外地校友前往他们那里,都会受到亲人般的热情接待。从八十年代后期起,老校友们编写出版了好几本纪念母校和老校长金海观先生的书,如《金海观九十诞辰纪念专刊》、《陶行知与湘湖师范》、《金海观与湘湖师范》、《金海观传》等,极大地充实了校史资料。老校友们还组织了金海观教育思想研究小组,总结历史经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教育事业服务。去年是金海观老校长诞辰100周年,全国有近二十个地区举行了多种形

式的纪念活动。4月8日,金海观先生的家乡诸暨市举行了纪念金海观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8月4日,浙江省民进、杭州市民进、萧山市民进联合在杭州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10月19日,上海市湘师校友会举行了金校长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以上这三次纪念活动,我都有幸应邀参加了。当我看到有些老校友,年事甚高,由子女搀扶着前来纪念金校长,那种魂系梦牵的深情,我十分感动。我想,金校长逝世已将近三十年了,人们仍这样怀念他,崇敬他,这是与金海观老校长崇高的人格品德分不开的;是与金校长主持校政二十五年杰出的办学业绩,特别是抗战八年期间带领师生辗转浙西南山区流亡办学,历尽艰辛,师生之间同命运共患难分不开的;是与解放战争年代,金校长坚持民主、进步,保护和支持大批学生投奔革命分不开的。在办理湘师的过程中,金校长倡导形成了“苦硬、实干、研究、进取、注重情谊”的湘湖精神,这也是一种卓异的校风和优良的办学传统,它熏陶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湘师人,凝聚了校友们对母校、对金校长的神圣情缘。

金海观校长是陶行知先生的高足。1932年他放弃了成都大学教授的优裕职位,出任湘师校长,以实现他探索已久的从启迪民智、改善农村面貌入手,进而振兴中华的夙愿。到校后,他审时度势,定下奋斗目标,运用先进理论,特别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以身作则,苦干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事业,使湘湖师范享誉社会,成为生活教育园地中的奇葩。新中国建立后,金海观校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意气风发,除主持校政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1950年担任首届萧山教育工会主席,1956年当选为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至1956年间,当选为镇、县、省三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1956年被推选为民进中央候补委员;1954年起,金海观校长就参加省政协活动。1956年,萧山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成立,金海观校长当选为副主席。在这些繁忙的社会活动中,金海观校长积极参政议政,

仗义执言,献计献策,发挥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作用,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今日湘师,是昨日湘师的继续和发展。在新形势下,学习陶行知,学习金海观,对我们进一步办好学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老校长的崇高品格,以及他的教育思想、教育业绩和教育实践经验,是我们湘师的一笔珍贵精神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级的领导下,学校党政班子坚持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以“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为校训,团结和依靠全校师生员工,围绕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受农村欢迎的合格小学教师这一中心,努力进取,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和改革得以稳步前进,呈现出奋发向上的好势头,同时湘师也已成为省、杭州市开展学习和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要基地之一。目前,面临世纪之交,湘师即将迈入更加美好的二十一世纪。今年10月1日,是湘师创办七十周年纪念日,回顾历史,我们更加怀念和崇敬老校长金海观先生。湘师校歌中有这么两句:“努力引导,后波更比前波高;努力创造,后人更比前人好。”我们要不负老校长和老校友们的心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重振湘师雄风,再铸湘师辉煌,以新的业绩庆祝建校七十周年,告慰于老校长金海观先生。

(作者现任浙江湘湖师范学校校长)

省办后，命名为慈溪锦堂乡村师范学校。同年8月设立杭州师范学校。1931年4月，省教育厅制定了整理师范教育方案，从此浙江的师范教育出现了转机，到1932年，全省共有师范学校与师资训练机构39所（处），学生人数达到2420人。

在浙江的师范学校中，湘湖乡村师范独树一帜，在浙江甚至全国都具有重大影响。湘湖乡村师范是采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建与办学的。陶行知于1920年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提倡教育改造运动，宣传乡村教育，而后又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口号，构成其“生活教育”理论；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后于1930年4月为国民党政府查封）培养乡村教育师资。时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即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区负责人蒋梦麟等亦拟在浙江筹办一所乡村师范，特邀陶行知来浙，参加了学校筹备会议，后又将办校事交陶先生办理，并根据沈定一的将学校办在萧山湘湖的提议，经省政府同意后，在萧山西乡闻家堰东南五华里的湘湖定山办起了浙江乡村师范学校。由于学校办在湘湖，不久改名为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湘师创办初期按晓庄规范办学。湘湖师生在实践过程中，有不少创造，特别是1932年2月金海观接任校长以后，推陈出新，使湘师日臻完善，在教育制度、教学设施与教学方式等方面，更富生机，颇具特色，为我省、我国师范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突出的贡献是：

一、施行“改革”。继生活教育制，先后又有弹性制和创建的“工学制”、“战时教育制”。

“弹性制”，是刘澡校长为完善生活教育制而设立的，即学生可通过自学修完指定的课程，经过学校考核，然后被介绍出去到各地任小教工作，但不作毕业论。学生出校后，在工作岗位上经过一学期或一学年的锻炼，由自己选择研究专题写一篇论文，送交学校，经审查合格，发给毕业证书，才算正式毕业。因而学生在修业一年半或两年后，都陆续走上教学工作岗位。

“工学制”为金海观校长所创建,受生活教育制影响,但又有别于生活教育制。它旨在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使学生毕业后回到农村能与农村生活相适应。招生时,曾把“劳动考试”作为录取的参考。入学后参加湘湖周围环境的改造,诸如筑堤、开河、修环山马路、打井、造房等劳动项目。此外 200 余亩的校产田,其中一部分亦由师生共同耕种。这是在继承陶行知教育思想上的一大发展和创举。

“战时教育制”是金海观校长继“工学制”后为适应全国抗日战争的环境与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八年抗战中,金海观坚持“无论时局变化至何种程度,学校决不散”,湘师南迁流亡办学,七迁校址,实行战时教育制。战时教育制以抗日为中心,结合当时形势与环境,进行多种特种训练,既学习文化知识,又进行军事训练,增加师生的军事知识与军事技能。主张“师范学校应该是国家的文化战士培养机关,使其养成为战斗员,外抗文化侵略,内除文化障碍”。策励学生“到游击区去办教育,一面办学,一面抗战工作”,派毕业生深入敌后,从事教育进攻。“战时教育制”的实施,使流亡青年和山区的农民子弟既学到了文化知识又懂得了抗敌救国的道理,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教育人才。

二、强调“乡村”,重视整个乡村社会的改造。

以农立国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村的变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中国,一般说来,中国农村是封闭式的,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其活动世界仅限于所在村庄方圆数十里。他们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俗、道德观念和宗族意识,每个村庄都具有牢固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农村状况不改变,农民得不到劳动的权利,没有文化科学知识,要想整个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因此,基本教育的实施区域,应着重在农村,基本教育的对象也应着重在农村。强调学校具有教化、改造社会的功能,本是中国入古老的传统。古人云:“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

之。”湘师办在农村，为乡村培养师资，正是着眼于教化、改造农村社会，改变农村的状况。湘师培养的学生“人人要带土气，处处宜有书香”，只有这样的学生才能担当起教化改造乡村社会的重任。湘师创办之初，在萧山石岩村开办“湘湖医院”，就是为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解决农民医疗问题。湘师又在周围农村推行“小先生”制，以小学生为师，向其不识字的长辈进行识字教育，以达到逐步扫除农村文盲的目的。

湘师在办学过程中，处处事事把学校置身于国家民族的兴衰安危之中，置身于现实社会的改造和发展之中，因而湘师师生十分重视民众教育、社会教育。金海观校长提倡，一面办学，一面协办学校附近的地方事业，因而在萧山以及抗战爆发后学校迁至的义乌江湾，松阳古市，庆元竹口、新窑、黄坛，及景宁道化等地，都办了大量的民校、夜校，仅松阳古市镇在1938、1939两年中，湘师师生就办了91所147个班，吸收学员4300人。在景宁道化还办了“教育担”，把教育送到崇山峻岭中去。此外，在湘湖东乡石岩办起了生活改进区，在松阳古市办起了经济建设实验区，从文化、经济、政治诸方面入手，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实验，旨在改造整个乡村社会。

三、突出“师范”，重视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近年教育界人士的热门话题，湘师创办伊始即突出“师范”作用，学校实行德、智、体、美、生产劳动五育并重，课程设置除初创时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动植物等基础课程外，后又增设了农业、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验统计、小学教材教法等“师范”专业课程；同时，每周抽一定时间从事农业劳动。

金海观任校长期间，把系统的课堂教育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结合得更完美。在课外组织兴趣小组，设置一个发展学生特长的环境，各种学科修习到一定标准以后，可以让学生学习自己喜爱的东西，不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体育以至学校课程中所没有的东西。学校还设有绘画组、音乐组、戏剧组、工艺组、农艺组、